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12 ·

社會科學總論類

中國問題
中國問題的分析

王造時著

胡適等著

上海書店

胡

適等著

中 國 問 題

引 言

胡適之先生，在他的我們走那條路？那篇文章前面，本來有一段「緣起」；「緣起」中間有這樣的幾句話，如今引來算做本書的緣起：

我們幾個朋友在這一兩年之中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各人隨他的專門研究，提出論文，供大家的討論。去年「一九二九——一九三〇」我們討論的總題是「中國的現狀」，討論的文字也有在新月上發表的。如潘光旦先生的論才丁兩旺（新月二卷四號），如羅隆基先生的論人權（新月二卷五號）。都是用討論的文字改作的。今年「一九三〇——一九三一」我們討論的總題是「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分了許多子目，如政治，經濟，教育，等等，由各人分任。………

後來這第二批討論的文字也有一大部分陸續在新月上發表了。

下面十篇文字裏，六篇是討論會的產果。第一篇適之先生的我們走那條路？就代表著第一次討論會的成績。當初大家因為覺得在討論分題之前，似乎應該有一箇比較可以公認的根本態度；這根本態度的推敲，大家就請適之先生擔任了下來。 羅隆基先生的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青松先生的怎樣解決中國的財政問題，鄭放翁先生的制度與民性，全增嘏先生的宗教與革命，沈有乾先生的我的教育——便都是分題討論的成績了。討論會不止六次，題目也不止六箇，但有的沒有能寫成文稿。

其餘四篇裏的三篇，劉英士先生譯的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一篇外論，吳景超先生的中國農民的生活程度與農場，拙作姓，婚姻，家庭的存廢問題，先後也在新月上發表過。雖與上文所提的討論會沒有關係，但所論却是今日中國問題的最迫切的幾箇方面，正可以補討論會的成績的不足。

拙作優生的出路是最近才寫成的，見新月第四卷第一期。我以前在討論會

裏提出的題目是人文選擇與中華民族，後來覺得所論的範圍過於狹小，新月同人發起編印這本書的時候，我就答應另外寫一篇。耽擱了許久，最後纔算交了卷。十篇文字，開頭雖有適之先生那篇提綱絜領的筆墨，却並不是完全打成一氣的。中間一定有不少的重複，衝突，甚而至於彼此抵銷的地方。例如制度與民性一文以制度爲重，而優生的出路則以人才爲重，法治與人治的抵觸是顯而易見的。但至少有一點是大家可以公同認可的，即中國應走循序演進的一條路。我們決沒有甚麼終南捷徑，可以“一蹴驟幾”富強的境界。

一九三二·八·一三，潘光旦。

目 錄

序

我們走那條路.....	胡適	一一一	二三
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	羅隆基	二四一	五八
怎樣解決中國的財政問題.....	青松	五九一	八五
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一篇外論.....	劉英士譯	八六一	一一六
中國農民的生活程度與農場.....	吳景超	一一七	一一三
制度與民性.....	鄭放翁	一三三	一一四
宗教與革命.....	全增嘏	一四七	一一六
姓，婚姻，家庭的存廢問題.....	潘光旦	一六七	一一九
我的教育.....	沈有乾	二〇〇	一一二
優生的出路.....	潘光旦	二二三	一一六

我們走那條路？

胡 邁

我們今日要想研究怎樣解決中國的許多問題，不可不先審查我們對於這些問題根本上抱着什麼態度。這個根本態度的決定，便是我們走的方向的決定。古人說的好：

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蹈于溝壑。（淮南氾論訓，文字依章林引。）

這正是我們中國人今日的狀態。我們平日都不肯澈底想想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也不肯澈底想想究竟。我們應該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地。事到臨頭，人家叫我們向左走，我們便撐着旗，喊着向左走；人家叫我們向右走，我們也便撐着旗，喊着向右走。如果我們的領導者是真真睜開眼睛看過世界的人民，如果他們確是睜着眼睛領導我們，那麼，我們也許可以跟着他們走上平陽大

路上去。但是，萬一我們的領導者也都是瞎子，也在那兒被別人牽着鼻子走，那麼，我們真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大危險了。

我們不願意被一羣瞎子牽着鼻子走的人，在這個時候應該睜開眼睛看看前面有幾個岔路，看看那一條路引我們到那兒去，看看我們自己可以並且應該走那一條路。

我們的觀察和判斷自然難保沒有錯誤，但我們深信自覺的探路總勝于閉了眼睛讓人牽着鼻子走。我們並且希望公開的討論我們自己探路的結果可以使我們得着更正確的途徑。

• • • •

在我們探路之前，應該先決定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我們的目的地。這個問題是我們先決問題，因為如果我們不想到那兒去，又何必探路呢？

現時對於這個目的地，至少有這三種說法：

(1) 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於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2) 中國青年黨(國家主義者)說，國家主義的運動『就是要國家能夠獨立，人民能夠自由，而在國際上能夠站得住的種種運動。』

(3) 中國共產黨現在分化之後，理論頗不一致；但我們除去他們內部的所謂史太林——托洛斯基之爭，可以說他們遠有一個共同目的地，就是『鞏固蘇聯無產階級專政，護擁中國無產階級革命。』

我們現在的任務不在討論這三個目的地，因為這種討論徒然引起無益的意氣，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所能打了的筆墨官司。

我們的任務只在於充分用我們的知識，客觀的觀察中國今日的實際需要，決定我們的目標。我們第一要問，我們要剷除的是什麼？這是消極的目標。第二要問，我們要建立的是什麼？這是積極的目標。

我們要剷除打倒的是什麼？我們的答案是：

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

第一大敵是貧窮。

第二大敵是疾病。

第三大敵是愚昧。

第四大敵是貪污。

第五大敵是擾亂。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那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為什麼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為什麼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為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壞，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嗎？故即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剷除這五大敵人。

這五大敵人是不用我們詳細證明的。余天休先生曾說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在貧窮線以下。張振之先生（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估計貧民數目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張先生引四川李敬穆先生的話，說，依據甘布爾，狄麥爾，以及北京的成府，安徽的湖邊村的調查，中國窮人總數當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五十。（李先生假定一家最低生活費爲一三〇元至一六〇元，凡一家庭每年收入在這數目以下，便是窮人。）近來所得社會調查的結果，如李景漢先生『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等書所報告，都可以證明李敬穆先生的估計是大體不錯的。有些地方的窮人竟在百分之七十三以上（李景漢調查北平郊外掛甲屯的結果），或竟至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民十一華洋義販會調查結果）。這就離余天休先生的估計不遠了。這是我們的第一大敵。

疾病是我們種弱的大原因。瘟疫的殺人，肺結核花柳病的殺人滅族，這都是看得見的。還有許多不明白殺人而勢力可以毀滅全村，可以衰弱全種的疾病，如

瘧疾便是最危險又最普遍的一種。近年有科學家說希臘之亡是由於瘧疾，羅馬的衰亡也由於瘧疾。這話我們聽了也許不相信。但我們在中國內地眼見整個的村莊漸漸被瘧疾毀為荆棘地，眼見害瘧疾的人家一兩代之後人丁滅絕，眼見有些地方竟認瘧疾為與生俱來不可避免的病痛（我們徽州人叫牠做『胎瘧』，說人人都得害一次的！），我們不得不承認瘧疾的可怕甚于肺結核，甚于花柳，甚于鴉片。

在別的國家，瘧疾是可以致死的，故人人知道牠可怕。中國人受瘧疾的侵害太久了，養成了一點抵抗力，可以苟延生命，不致于立死，故人都不覺其可怕。其實正因為牠殺人不見血，滅族不留痕，故格外可怕。我們沒有人口統計，但世界學者近年都主張中國人口減少而不見增加。我們稍稍觀察內地的人口減少的狀態，不能不承認此說的真確。張振之先生在他的中國社會的病態裏，引了一些最近的各地統計，無一處不是死亡率超過出生率的。例如

廣州市 十七月五月到八月 每週死亡超過出生平均為六十人。

廣州市 十七年八月到十一月 每週死亡超過出生平均六十七人。

南京市 十七年一月到十一月 平均每月多死二百七十一人，每週平均多死六十二人。

不但城市如此，內地人口減少的速度也很可怕。我在三十年之中就親見家鄉許多家絕調衰滅。疾病瘟疫橫行無忌，醫藥不講究，公共衛生不講究，那有死亡不超過出生的道理？這是我們的第二大敵。

愚昧是更不須我們證明的了。我們號稱五千年的文明古國，而沒有一個三十年的大學。（北京大學去年十二月滿三十一年，聖約翰去年十二月滿五十年，都是連初期幼稚時代計算在內。）在今日的世界，那有一個沒有大學的國家可以競爭生存的？至于每日費一百萬元養兵的國家，而沒有錢辦普及教育，這更是國家的自殺了。因為愚昧，故生產力低微，故政治力薄弱，故知識不夠救貧救災救荒救病，故缺乏專家，故至今日國家的統治還在沒有知識學問的軍人政客手裏。這

是我們的第三大敵。

貪污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大特色。不但國家公開『捐官』曾成爲制度，不但二十五年沒有考試任官制度之下的貪污風氣更盛行，這個惡習慣其實已成了各種社會的普遍習慣，正如亨丁頓說的，

中國人生活裏有一件最惹厭的事，就是有一種特殊的貪小利行爲，文言叫做『染指』，俗語叫做『揩油』。上而至於軍官的尅扣軍糧，地方官吏的刮地皮，庶務買辦的賺錢，下而至於家裏老媽子的『揩油』，都是同性質的行爲。

這是我們的第四大敵。

擾亂也是最大的仇敵。太平天國之亂毀壞了南方的精華區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復。近廿年中，紛亂不絕，整個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毀了，東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殘破之區，土匪世界。美國生物學者卓爾登(David Starr Jardan) 曾說，

日本所以能革新強盛，全靠維新以前有了一百五十年不斷的和平，積養了民族的精力，才能夠發憤振作。我們眼見這二十年內戰的結果，貧窮是更甚了，疾病死亡是更多了，教育是更破產了……避兵避匪逃荒逃死還來不及，那能辦教育？——租稅是有些省分預征到民國一百多年了，貪污是更明目張胆的了。（半官辦的中國評論週報本年一月三十日社論說，民國成立以來，官吏貪污更甚於從前。），然而還有無數人天天努力製造內亂！這是我們的第五個大仇敵。

以上略述我們認為應該打倒的五大仇敵。毀滅這五鬼，便是同時建立我們的新國家。我們要建立的是什麼？

我們要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

『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長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衛生行政。『普遍繁榮的』包括安定的生活，發達的工商業，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經濟制度，公

共的救濟事業。「文明的」包括普遍的義務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學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與普及。「現代的」總括一切適應現代環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經濟制度，教育制度，衛生行政，學術研究，文化設備等等。

這是我們的目的地。我們深信：決沒有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而不能在國際上享受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的。我們不看見那大戰後破產而完全解除軍備的德國在戰敗後八年被世界列國恭迎入國際聯盟，並且特別為她設一個長期理事名額嗎？

• • • •

目的地既定，我們才可以問：我們應該用什麼法子，走那一條路，才可以走到那目的地呢？

我們一開始便得解決一個歧路的問題：還是取革命的路呢？還是走演進。

(evolution) 的路呢？還是另有第三條路呢？——這是我們的根本態度和方法的問題。

革命和演進本是相對的，比較的，而不是絕對相反的。順着自然變化的程序，如瓜熟蒂自落，如九月胎足而產嬰兒，這是演進。在演進的某一階段上，加上人功的促進，產生急驟的變化；因為變化來的急驟，表面上好像打斷了歷史上的連續性，故叫做革命。其實革命也都有歷史演進的背景，都有歷史的基礎。如歐洲的「宗教革命」，其實已有了無數次的宗教革新運動作歷史的前鋒，如中古晚期的唯名論 (Nominalism) 的思想，如十三世紀以後的文藝復興的潮流，如弗郎西斯派的和平的改革，如威克立夫 (Wyclif) 和赫司 (Huss) 等人的比較急進的改革，如各國的君主權力的擴大，這都是十六世紀的宗教革命的歷史背景。火藥都埋好了，路得等人點着火線，於是革命爆發了。故路得等人的宗教革新運動可以叫做革命，也未嘗不可以說是歷史演進的一個階段。